

# 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

杨纪琬著

# 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建设

# 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

杨 纪 瓣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

杨纪琬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通县西定安印刷厂印装

850×1168毫米 32开 12印张 284 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005-0057-2/F·0052 定价：2.65元

## 自序

这本小册子选辑了我自1951年至1986年三十六年间在各种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文章34篇，作为三十六年的“代表作”，奉献给读者。

我从事写作，已整整半个世纪。1935年我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决定了我终身从事会计事业的生涯。我的第一篇习作，是1936年发表在上海《新闻报》的经济常识版。从此以后，课余之闲，常寄些小文给《新闻报》和其他报刊。1939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大约写了二十万字有关经济、会计、审计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敝帚自珍，故历经变迁仍保存下来。到十年浩劫期间，全部被焚，未能留下片言只字，至今仍觉痛惜。

前年春季，上海友人夏高波同志来信，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看到1946年9月15日出版的《公信会计月刊》第九卷第一期中，有拙作一篇，并复印寄我。时异世迁，四十年后见到自己青年时代的佚作，惊喜之情，可以想见。文章题目是《加强审计制度》，内容虽是向当时国民党政府进言，但批判之言辞可见。现将论文末段原文，照录如下：

“目前审计机关对于事后审计最为忽略。除了一、二特殊的纠举案件，尚能于事后作有计划详尽的审核外，此外从不闻审计机关于事后因审核各机关簿籍、凭证及报告而有揭发贪污的事情。我国官场的恶习，凡事事过境迁，即行了结，遂至养成官吏

在平时弁髦法令，任意胡为，造成既成事实之后，结果却任一走了事的习惯。虽然事后揭发，总不如事前制止为好，但事前既忽于稽察，则事后审核实为审计机关应努力的一件事。否则贪污者意图侥幸，审计机关耳目难周，即使加重事先审计，挂一漏万，仍使机诈者得以遁行，又岂得事理之平。

有官皆弊、无吏不贪的情形，是行政机关的耻辱，也是审计机关的失职。加强审计制度，乃是消灭贪污的最有效最切实的办法。”

在这里抄录旧作的目的，一方面这是目前收集到的解放前我发表过的仅有的一篇文章，录此一段留作雪泥鸿爪；另一方面是意在说明解放前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出于爱国热忱，对国民党政府既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恨其腐化无能，不免有所指责，稍加挞伐。这种矛盾心情，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直到解放后若干年，把新旧社会进行对比，才有所觉悟，终于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条真理。

解放以后，我一直在财政部任职，参与和组织了这三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建设以及会计事务管理工作。同时近几年来，我还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央财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担任财政科学研究所会计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因此，我的写作生涯是和我担任的行政工作、参与的社会活动、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历程，我的写作大致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

一是在“文革”前，我在担任行政工作的同时，兼任了《新会计》月刊（1951年1月至1952年2月，解放后我国第一本会计专

业刊物)、《工业会计》、《企业会计》、《会计》等会计专业杂志的主编，常为这些刊物撰写《社论》、《评论》以及制度介绍等文章，间或也为其他报刊代草有关会计工作的《社论》稿。那时我很少写具名文章，即使具名，也往往不是“代庖”，就是假名。所以，这本小册子里这一段时期的文章，仅选了几篇目前能够收集到的为报刊草拟的《社论》、《评论》。

二是在“文革”以后，会计工作随着四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会计理论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互相切磋交流的情况空前活跃，会计事业面临建国以来的最好形势。在起草或讨论有关会计法律、条例、制度以及研究有关会计事务管理工作时，自己不时发表一些意见。在各会计学术团体、高等院校作学术报告时，对这些意见加以条理和抽象，或者作理论上的阐述，便成为我对会计理论的某一方面问题的看法。所以，这本小册子里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大多是一些报告、讲话的记录稿。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反映了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一点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会计事业处于黄金时期，欣逢盛世，给了我从未有过的鼓舞和鞭策，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路，成为我有生之年写作较丰富的八年。

记得六十年代初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与娄尔行、赵玉珉、葛家澍、吴诚之四位教授在共同编写《会计原理》一书时，第一次提出了会计不仅具有阶级性、还有技术性的双重属性的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需要有点勇气，并为此而承担极大风险。拨乱反正以后，使我有条件重新探索如何摆脱旧框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新路子。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之际，我和阎达五教授提出“会计管理”概念，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分析了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工作

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在理论研究、教学和实务领域广泛使用“会计管理”概念。我们的意图在于引导从管理职能主体本身来对待会计工作和会计理论研究，由此为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开辟一条新途径。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概念经过数年的广泛讨论，得到会计界多数同行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实际工作者的赞同，也引起了国外会计界的关注。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期间，集思广益，并得到财政部谢明顾问的赞许，明确提出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对于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经济理论研究要服务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是极有裨益的。此后，围绕这一目标，我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必须结合中国国情、会计改革的指导原则等方面的论文。1984年，后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会计制度建设中十个方面关系”的论点，可以说，这是我长期从事我国会计制度设计工作实践的一点总结体会。1984年底，在中国成本研究会年会期间，根据会计管理的理论和成本核算的实践，提出了改革成本核算制度的建议。设想变单一核算制为多元核算制，计算法定（制度）成本、理论成本、责任成本、分析成本和社会成本等五种成本。在其后的一次成本研究会理论讨论会上，我将这五种成本归结为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两个方面，还设想了成本核算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意图使成本核算更好地为经营管理服务，走出一条新的途径。从1980年起我参加起草《会计法》，到1985年通过和贯彻实施《会计法》，这前后将近五年中，研究会计与法律的结合，既是工作中的重大任务，也是理论探讨的重大课题。在反复修订会计法的实践过程中，我归纳了针对性、可行性、责任可衡量性、重要性、相对稳定性等五条原则，并对用法律规范的形式，表述会计的性质和任务、会计的职能和作用、会

计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探讨。此外，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实施，从1980年以来，在如何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如何管理外资企业的会计工作，如何尽早实现我国会计电算化等一些新问题，我也不断进行研究与探索。偶有所得，便发为言词或草书笔录，形成了八十年代有关这方面理论阐述的几篇文章。如果说这些成果，对发展我国会计理论有所裨益，那是我最大的喜悦。

这本小册子虽然选了几十篇文章，但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看法，没有集中反映在一篇文章中，各篇独立成文，各篇之间并不连贯，编排顺序只是大体上按问题归类。由于不少文章并不仅仅论述到一个问题，因此，这种归类也不尽恰当，尚希读者谅解。

我行年七十，抚今思昔，乏善足陈，惟自审每有写作，大都是经过长时期的沉思默索而形成的自己的观点，往往为求此一得之见，历经数月的踟蹰，力求不宥于成见而有所创新，以期无愧于读者。虽立论未必正确，但可能有助于后人的探索与思考。这就是我汇集这本小册子的本意。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有几篇文章是同其他同志合写的，有些报告记录是由其他同志代为整理的，均在篇末加以注明。

这本书能够问世，得到中国财经出版社沈云同志和韩淑芳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丁平准同志在编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致谢意。

杨 纪 瓣

1987年春节于北京爆竹声中

# 目 录

## 自 序

《邓小平文选》是开创财会理论研究和财会工作新局 面的指南	( 1 )
会计工作要为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作贡献	( 5 )
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 8 )
会计工作在不断开拓中前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	( 35 )
《会计法》的理论基础	( 52 )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 76 )
认真坚持制度，善于执行制度	( 102 )
改革会计制度必须从实际出发	( 111 )
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建设问题	( 115 )
论“会计管理”	( 131 )
“会计管理”是一种价值运动的管理	( 145 )
关于“会计管理”概念的再认识	( 155 )
会计学的属性和记帐方法	( 166 )
论会计属性	( 169 )
加强会计工作，为国民经济调整、发展作出新贡献	( 179 )

会计的范围和职能	(200)
乘胜前进，努力开创会计理论研究新局面	(202)
关于会计理论发展的几个问题	(209)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含义	(225)
论会计改革的指导原则	(228)
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	(233)
当前成本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245)
微观经济成本管理和宏观经济决策对成本的影响	(263)
建立责任成本制是加强成本管理的核心	(274)
探索成本核算的新路子	(278)
改革财务成本，发展管理成本	(292)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会计问题和	
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	(307)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	(314)
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319)
外资企业会计工作管理的几个问题	(321)
会计与经济效益	(335)
发挥财会工作在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345)
关于审计理论的若干问题	(348)
开发人才，开发智力，尽早实现我国会计电算化	(361)

## 《邓小平文选》是开创财会理论研究 和财会工作新局面的指南

《邓小平文选》的出版，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大事，也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最近中央发出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这个号召对于我们财会理论界和会计工作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一定要精读这本书，学好这本书，要在认真阅读并领会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觉悟，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选》所纪录的年代，从“四人帮”还在横行霸道、垂死挣扎的1975年，到召开党的十二大的1982年，前后整整八年。在历史长河中，八年仅仅是极其短暂的一刹那。但就是在这短暂的八年中，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复的大变动。粉碎了“四人帮”，确立了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经济建设生机勃勃，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很快的发展，民主和法制逐步加强，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这是战斗的八年，是从大乱到大治、取得伟大胜利的八年，是历史伟大转折的八年。这八年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时间不远，我们都是过来人，大家记忆犹新，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而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段扭转乾坤的历史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从《文选》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的言论，反映了人民的心愿，表达了时代的要求，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所以说《邓小平文选》是我党新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著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指南。

当前，我们财会战线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之一，是如何开创财会理论研究和财会工作新局面，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财会理论方法体系。为了完成这项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从《邓小平文选》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提高我们的勇气，加强我们的信心，改进我们的工作。

学习《文选》，首先要学习邓小平同志那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革命胆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和排除万难、坚持真理的勇气。1975年，面对“四人帮”势力的猖獗，邓小平同志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多次发表了有关整顿的讲话；1977年他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著名论点，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所形成的枷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坚定地提出上述主张，就是革命胆略、气魄和勇气的高度表现。我们的财会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就应该用这种革命胆略、气魄和勇气，敢于坚持真理、明辨是非，不回避矛盾，敢于斗争。这样，就一定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工作上取得新的成就。

学习《文选》，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当前，我们的财会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否则我们就赶不上形势的发展、时代的要求。我们要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分析新矛盾，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财会理论方法体系，改革财务管理体制，改革会计核算体系，加强会计监

督，开拓会计管理的广阔领域，在四化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一系列工作，都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形势下，如果仍然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思想僵化，跳不出老框框，坚持凡是过去书本上写了的不能改，凡是别人没说的不能做，开创新局面就没有希望。会计理论上的“终极论”，坚持已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或者躺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上停步不前，无所用心，不仅理论将失去指导实践的生命力，而且会成为绊脚石，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学习《文选》，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作风。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四化建设中，实事求是就是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要研究中国的国情。改革的总目标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会理论体系的建设，财会工作的改革，都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实际出发。当前，我们国家已从长期动乱转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整个经济工作已从片面追求速度，转向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工业企业也从单纯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伴随着这三个战略性的转变，会计工作也必须从单纯的记帐、算帐、报帐，转向以经营管理为重点。财会的理论研究，也必须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服务。我们财会理论的建设要有中国的特色，要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能符合四化建设的需要，能反映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应当眼睛向内，植根于中国国土之中。当然，也应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学习他们的长处。但是，在“拿来”以后，必须加以“中国化”，而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我们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上。比如全国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社会主义的会计原则、财务会计体系、预算计划管理、

班组经济核算、指标分解、资金归口管理、内部经济核算以及经济责任制中的多种会计管理方法，都需要认真总结，不断改进提高，付诸实施，并要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纳入财会学科体系之中。外国有的，我们要研究，但绝不能照搬、照抄；外国没有的，我们可以创造，而且正在创造。一定要逐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

树立革命胆略，勇于探索创新，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局面。这就是我们学习《邓小平文选》在当前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

(本文系1983年8月5日在中国会计学会召开的首都会计界人士学习《邓小平文选》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会计研究》1983年第5期。)

## 会计工作要为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作贡献

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斗任务，又提出了五年内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的要求，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充分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也充分表达了我们数百万会计人员的心声。我们会计工作者决心把十二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到自己的具体工作中去，为开创新局面、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作出新的贡献。

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说：会计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二十年前，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明确指出：办经济离不开会计。经济愈发展，会计愈重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说：“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事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姚依林同志也曾有一次讲话中指出：“从我们国家的需要来说，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完全不低于科学技术。”我们认为，加强会计管理科学的研究，不断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对于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实现，会计工作也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纪律上初步扭转了十年内乱造成的混乱状态，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和经济工作上长期“左”倾错误给会计工作造成的严重后果，还需要作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当前，会计对于提高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事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多数同志所认识；会计工作本身的水平不高，同经济管理的要求还很不适应；许多单位会计数字不实和会计监督不严的问题十分突出。这种状况必须认真解决。否则，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不利于正确地集中、分配和使用资金，不利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利于反对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不利于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

为了迅速改变上述这种情况，我认为，一方面要下功夫抓好会计工作的整顿，包括会计的基础工作、会计工作秩序、会计工作纪律、会计制度的整顿和会计人员思想、作风的整顿等，同时还要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抓紧会计立法。会计立法是加强经济工作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会计工作曾经两次遭到严重挫折，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被否定，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被破坏，会计人员行使国家赋予的职权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结果会计工作混乱，经济上损失浪费、违纪违法等现象严重，经济效益不高。历史的经验和当前会计工作上的问题都说明，需要制定《会计法》，需要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肯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以法律保证会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职权，充分发挥会计核算和监督的职能作用。

第二，抓好会计人员的培训。目前会计人员的状况同其他各方面的干部状况一样，也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和青黄不接问